

# 奥地利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社群分布

郭 俭

(香港城市大学 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 香港)

[关键词] 奥地利; 华人研究; 移民研究; 新移民; 改革开放; 冷战

[摘 要] 论文在对二次大战前后奥地利华人历史和经济活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 重点对20世纪80年以来奥地利华人的社群分布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多种华人移民潮和流向相互交错之下, 奥地利的华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社群, 无论在移民来源地或是社会经济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源于这种多元性, 华人社会内部出现了阶层划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东西方冷战结束这两种因素, 使奥地利的华人移民景观发生变化。“中国移民新秩序”格局的形成, 对中国人的全球性移民造成深远的影响, 延及奥地利。冷战后东西方集团取消政治边界, 使奥地利成为中国移民在流向西欧、东欧或是南欧的旅途中最受欢迎的过道。奥地利因此从非侨乡新移民的临时落地地转变成中国移民的安身落户之所。

[中图分类号] D634.3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2)04-0031-10

## Migration History and Community Mapping of Chinese in Austria

KWOK Kim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Community College of City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in Austria; new Chinese migration order; migration history; community mapping; Chinese sub-groups

**Abstract:** This article offer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Austria and explains its fluctuation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Europe in general. Moreover, through delineating and analyzing the subgroup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ustria since the 1980s, it elaborates how Austria has changed from a temporary passageway to a permanent home for those new Chinese migrants who came from non-traditional Qiaoxiang areas.

### 一、欧洲华人研究与奥地利

根据欧盟2009年的数据, 目前居住在27个欧盟成员国里的中国公民约有59万人。<sup>[1]</sup> 如果已经成为欧洲公民或在欧洲出生的华裔也包含在内的话, 一般估计, 欧洲的华人已经超过200万人, 甚至是250万人。<sup>[2]</sup> 然而, 学术界对欧洲华人<sup>①</sup> 社会的研究历史较短, 始于20世纪90年代, 相对于东南亚华人和北美洲华人的研究而言, 是一个后起的课题。1998年出版的由欧洲学者班

[收稿日期] 2012-04-10; [修回日期] 2012-08-28

[作者简介] 郭俭, 女, 维也纳大学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① 本文以“欧洲华人”统称所有在欧洲生活的华人族群, 包括在欧洲出生者、已经加入当地国籍者、1978年前迁移欧洲的老移民以及1978年后迁移的中国新移民。中国新移民指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 其中以来自大陆的为主体。

国瑞 (Gregor Benton) 和彭柯 (Frank Pieke) 主编的《欧洲华侨华人》( *The Chinese in Europe* ) 是第一部以整体欧洲华人为主题的英文论文集。《欧洲华侨华人》开创性地涵盖了西欧、东欧和南欧的华人移民, 提供了基本的人口数据, 并对他们的移民方式、社会经济状况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里, “欧洲华人”这一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大大小小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正如学者李明欢所归纳, 国外学者 (包括华裔学者) 的“欧洲华人”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个别欧洲国家的华人研究, 如 Pal Nyiri 在 1999 年出版的《欧洲中国新移民: 以匈牙利华人社群为例》(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Europe: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ungary* )、Maggi Leung 在 2004 年出版的《德国华人移民: 在跨国空间中塑造家园》( *Chinese Migration in Germany: Making Home in Transnational Space* ), 以及 Gregor Benton 和 Edmund Terence Gomez 合著而出版于 2008 年的《英国华人》(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 - 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另一类是专题研究, 主要著作包括 Frank Pieke 与同仁合著、以跨国主义为审视角度的《跨国华人: 福建移民在欧洲》(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 还有 Flemming Christiansen 探讨当代华人政治文化认同的《欧洲唐人街: 朝向 21 世纪欧洲华人认同观》(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 等等。<sup>[3]</sup> 在国内, 先驱者李明欢早于 1999 年已经发表了一份《欧洲华人社群》(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Europe* ) 的报告; 2002 年更出版了 70 余万字的《欧洲华侨华人史》, 综合性地论述欧洲华侨华人的历史以及生活现状, 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一直以来的空白。此后李教授还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涌现, 对我们了解欧洲华人多有助益。而其他学者如宋全成、王异虹和徐华炳等也对相关课题提出过值得参考的意见。

“欧洲华人”这十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中外学者已经大致勾画出欧洲华人的移民历史、社会结构和变迁等。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西方的高等教育经济以及不断修订的移民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互动激荡下, 中国的外流移民潮在过去数十年间展示了崭新的流动模式——正如彭柯所提出的“中国移民新秩序”。综合彭柯、李明欢和宋全成的观察, 在新世纪的欧洲, “中国移民新秩序”恰恰反映在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和趋势上: 一是欧洲华人人口规模壮大, 使欧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是中国新移民来源地和社会背景多元化。欧洲的华人主要是来自浙江、福建和广东侨乡的非精英移民, 但是非侨乡的精英移民 (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学生移民) 也在迅速增长; 三是欧洲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大潮中发展了餐饮业、商品批发、零售以及旅游业等, 整体上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四是在欧洲还有一定数量的非正规中国移民, 他们属于华人社会里的草根阶层, 经济和社会地位很脆弱; 五是欧洲华人呈现跨国化生存的趋势。<sup>[4]</sup>

奥地利是一个拥有 800 多万人口的中欧小国, 地处东欧和南欧区块新兴华人移居地以及西欧旧核心国家之间。<sup>[5]</sup> 它和比利时、瑞士以及北欧等国家被称为中国移民的“半边缘”国家, 因为对于侨乡以外的中国人来说, 在改革开放初期, 这些国家不是最受欢迎的移居地。不过, 因为地处要冲, 奥地利成为各种中国新移民的共同过境地。随着时光的流逝, 尤其是在“中国移民新秩序”的语境中, 许多非侨乡的中国新移民逐渐把奥地利视为安居之所, 甚至是他们的最终移居地。而上述“中国移民新秩序”的一些特征和趋势也反映在奥地利的华人社会中。

必须指出的是, 以上所提到的中外论著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奥地利这个中欧小国。在中文和英文学术界, 人们对于奥地利华人的状况仍然缺乏具体的认识。在奥地利, 有关华人的文章不仅零星分散, 涵盖面也有限,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以华人为主题的硕士论文, 但大多以德文书写, 而且缺乏对奥地利华人移民史的整体梳理。<sup>[6]</sup> 本文旨在填补欧洲华人研究的这一空缺。首先, 本文将提供一个在欧洲华人移民格局中关于奥地利华人移民的历史叙述。其次, 说明从 1980 年以

来，奥地利如何从非侨乡新移民的临时落脚地转变成他们的安身落户之所。本文的分析主要根据剪报、回忆录、官方统计数字以及笔者从2005到2009年为撰写博士论文而从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采用顺时序的叙述结构，先回到20世纪之交，再叙述二战后华人社群的发展，最后以近期奥地利华人社会人口特点的概览作为结束。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早期华人

中国和欧洲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往来联系，但华人移居欧洲的现象，却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这段时期的华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同性质的华工，另一类是贸易商。就前者来说，除了聚居在欧洲几个港口城市的华人船员以外，还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到英国、法国和俄国从事修建公路、坟墓和战壕的大约10万名华工。<sup>[7]</sup>

奥地利华人和后者（贸易商或街头小贩）的关系较深。这些贸易小商人或街头小贩来自浙江温州腹地青田地区，那里山多地少，资源贫乏。为了生计，青田人在农耕之外兼做青田石雕。20世纪初到一战之前，青田人已经在欧洲出现。一战时，合同华工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山东，大约2000名则来自青田。一战后，几乎所有山东人都返回了中国，但有半数的青田人却选择留居欧洲，据说部分人后来还带来他们的家人和亲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青田人移民欧洲的黄金时期。据估计，当时散布在欧洲大陆的青田人约有2.5万人。他们以经商、在街上售卖中国手工艺品如瓷器、石雕和玻璃来维生。<sup>[8]</sup>有记录显示，当时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形成了一个青田小贩的聚居区，<sup>[9]</sup>也有学者相信当时居住在意大利米兰的青田人从事丝绸生产。<sup>[10]</sup>

有则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佚事也许可以说明华人在奥地利初次出现的情况。有两名中国船员在1780年2月8日乘奥地利东印度公司的船只Kaunitz抵达当时哈布斯堡王国（Habsburg Monarchy）的海港阿的里雅斯特（Trieste），后来他们和船长一起来到维也纳。这两个船员中，有一个曾经在萨尔斯堡州（Salzburg）当过十年的纺织工人，后来落户于上奥地利州（Upper Austria）一个名为Nussdorf的小村庄。他入赘一户农耕人家，并因为村人不大读他的名字而冠以妻子的姓氏。<sup>[11]</sup>

在20世纪初期，为数不多的华人开始在奥地利定居，其方式和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大致相同。奥匈帝国的保守报刊《帝国邮报》（Reichspost）的记载可以证明早期青田街头小贩在维也纳以及周边地区的活动。在西方，广泛传播的黄祸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敌意，使这些青田人成为了敌对的目标。1913年2月19日《帝国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夏入侵维也纳”（Chineseninvasion in Wien）的文章：<sup>[12]</sup>

近来在维也纳及附近地区，明显可见低阶层的中国人人数大增……他们穿着油腻腻的中国服装或不正经的欧洲服饰越过马路，在一些热闹地区吸引了一些观众，如在溜冰场前面，他们从大袋子或篮子里拿出了各种各样的扇子、新奇物品和雕像，偶尔向男士、更多时候向女士展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违反了小贩和税务条例，肯定还损害了顾客的利益。现在是有关当局制止这些行为的时候了。

结果有24名中国人在1914年被递解出维也纳。<sup>[13]</sup>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中国人返回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乡郊Breitensee地区似乎出现了一个华人小社群，他们在酒馆售卖中国珍奇物品，有时还聚集在咖啡馆打麻将。<sup>[14]</sup>据估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有1000名青田人在奥地利定居。<sup>[15]</sup>来到奥地利的除了街头小贩之外，还有学生，且大部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交换学生的方式前来的。这些学生的理想职业大多属于具有实用价值的范畴，如医药、法律、科技和德语。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同时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希望借此修正中国人被扭曲的形象。

俞叔平是当年的学生。他在晚年时回忆了中国留学生与青田人的往来，也生动地叙述了青田

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客居异地的普遍经历：<sup>[16]</sup>

当时我们在维也纳有个中国留奥同学会，为了使馆人员的恶劣态度，想采取激烈手段，替他们出气……那些穷苦的青田人，说来非常可怜，因青田地瘠民贫，自然的灾难，逼着他们向外跑，既无护照，又无旅费，十之八九，都是混在外国商船的洗衣工作里出去的。在意大利或法国上岸，就被当地的警察抓住，驱逐出境，因为遣送回国，耗费甚大，只好在国与国之间送来送去，他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周游列国。因为是浙江老乡，我替他们在法院里当通译，实际上他们的青田话，比德文还难懂，只好替他们说句好话就是了……我就邀约几个同学，替他们办了一个中德文的补习班，和他们建立了友谊关系。

奥地利在 1938 年 3 月被纳粹德国吞并。在纳粹时期，所有居住在德语地区的中国人都有回返家乡的愿望，但其中一些人如愿以偿，一些人却未能成行。虽然官方没有纪录显示有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但一如其他外国人，中国人也避免不了针对外来种族而导致的骚扰和敌意。<sup>[17]</sup> 在留下来的数十名中国人当中，相信有一些被秘密警察指控为特务，因此被拘禁在集中营里。<sup>[18]</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奥地利的华人移民史突然中断。

### 三、餐饮业在二战后的发展

奥地利在二战后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少数留下来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些排除万难，成功地重建家园。二战结束不久，维也纳就出现了两家中国餐馆。当地报刊《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eszeitung) 为其中一家作了报道：<sup>[19]</sup>

受人尊敬的叶仁振（音译）先生的上海餐馆坐落在 Meidlinger Hauptstrasse 的一栋小楼里。餐馆里桌椅铺上漆布，整齐干净，和 Meidling 地区一般的酒馆或 Neubaugürtel 街上完全采用欧洲室内装修的另一家中国餐馆没有太大区别……目前，维也纳的华人要吃到合口味的饭菜不容易。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白米。这两家餐馆差不多供应所有华人的餐饮，它们都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

这份 1948 年的文献是奥地利第一份关于中国餐馆的纪录，显示华人移民展开了新纪元：数十年努力经营餐饮业，一直延续至今。当时也许没有人预测到经营中餐馆会成为华人在奥地利的主要生存策略。除了餐饮业，中国人中也有以当建筑工人或信差维生的。<sup>[20]</sup> 不过，整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经商和生活仍然十分艰难。中餐馆的数量和华人一样依然不多。后来在维也纳大学担任中文讲师的徐芝秀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来到维也纳，也在其中一家中国餐馆打工。她在 1995 年接受访问时透露，因为那时大众收入普遍低微，所以中餐馆的生意欠佳。不过，中餐馆却成了维也纳为数不多的华人聚集的地方。<sup>[21]</sup>

二战以后，欧洲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华人移民潮。一次是由经济因素所推动的，其中包括大量来自香港以及少量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去英国的华人。这些移民后来在西欧餐饮业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再转向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德国和北欧。另一次是由于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政治动乱和经济不稳定，迫使大量来自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印尼的华人离开原住国，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与前殖民国的联系迁移到法国与荷兰。

奥地利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在亚洲建立殖民关系，所以在东南亚政治动乱时期不曾有亚洲移民的涌入，也没有大量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而台湾人的到来，就形成二战后在奥地利比较显著的华人群体。这一群体的先驱者是一些原籍山东的退伍军人，他们在 1949 年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又在 20 世纪 50 或 60 年代选择欧洲作为人生的下一个驿站。其中一部分来到奥地利，直接从台湾或是通过另一国家（比如说德国）带来了资本和厨艺。由于很受奥地利人欢迎，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后继者仿效这些先驱，陆续来到奥地利从事餐饮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台湾人所建立的餐饮业市场逐渐被大陆来的浙江人所抢占。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有名的来自台湾的山东人齐景山和吴家财，他们的后代在今天奥地利

的餐饮业界仍然十分活跃。

20 世纪 70 年代，华人社群和中餐馆开始逐渐增长。一般相信，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维也纳出现了三家中国餐馆，全部由台湾人所拥有；十年后，也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已经有 60 家中国餐馆。根据奥地利学者 Kaminski 和 Unterrieder 的估计，当时有一半以上的中餐馆由台湾人所拥有。而居住在维也纳的华人约有 1000 人，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台湾。<sup>[22]</sup> 这时期华人社群的人数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不相上下。

#### 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奥地利华人的社群分布与特征

根据官方数据，自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中国新移民潮以来，奥地利的华人人口有增无减。从 1981 到 1991 年，人数从 800 人激增到 3537 人，十年当中翻了四倍。从 2001 到 2010 年的十年间，虽然面对奥地利更严格的入境条例，华人人口却有了双倍增长。目前在奥地利，有 9897 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台湾护照”，其中 6012 人以首都维也纳为家，超过奥地利所有华人人口的一半。在之前的三个十年中，有 7933 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台湾护照”的中国人加入奥地利国籍。<sup>[23]</sup> 这显示官方统计数字当中有一部分拥有华人背景的人被隐藏在“奥地利”的类别底下。把这两个数字相加，会看到奥地利有大约 1.7 万名华人。然而，面对这些数字笔者还是存疑。比如，有多少华人加入奥国国籍后离开奥地利或死亡？在奥地利出生并拥有奥国国籍的第二、第三代又有多少人？这些都没有官方记录可寻。此外，也没有记录显示有多少华人拥有印尼、柬埔寨或越南护照。除此之外，绕过官方移民渠道来到奥地利的非正规华人移民的数目或“黑数据”（Dunkelziffer，用奥地利传媒习惯的说法）仍然是个“神秘”的问号。寻找政治庇护者的数字也许可以让我们一窥真实的图景。奥地利内政部的记录显示，从 1980 到 2010 年，总共有 4000 多名声称来自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中国人在奥地利申请难民庇护而不获批准。如果申请者获得难民身份，他们就会逐渐地被纳入正规的华人统计数字中，否则就变成“黑数据”中的一员。综合上述群体以及难民申请者的数目，笔者估计，大约有 2.5 万名华人居住在奥地利，其中 1.5 万人居住在维也纳。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估算并非精确的数据，只是用作一般的参考。

表 1 1961 - 2010 年的奥地利华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年份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2010
奥地利	18	73	800	3537	4567	9897
维也纳	16	53	510	1770	2660	6012

资料来源：1961、1971、1981、1991、2001 年奥地利人口普查；2011 年奥地利统计年报。

表 2 申请政治难民的中国人

	来自中国大陆	难民申请成功个案	来自中国台湾	难民申请成功个案
1980 - 1989	55	—		
1990 - 1999	272	—		
2000	53	—	37	—
2001	95	—	59	—
2002	666	0	113	0
2003	573	6	88	4
2004	571	4	92	1
2005	468	0	24	0
2006	194	25	18	0
2007	209	35	14	0
2008	223	18	13	1
2009	368	38	30	10
2010	200	29	17	3
总数	3947	155	505	19

资料来源：奥地利内政部难民申请 1999—2010 年度数据。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地利的华人社会经历了重大变化,即出现了显著的人口增长以及社会经济面貌的多元化。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移民新秩序”格局之中的部分趋势。

具有侨乡背景的浙江人是奥地利华人社会的主体。虽然没有任何数据证实,但在奥地利华人之间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来自青田和温州地区的浙江人在华人总人口中占大概七成。浙江人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以往的移民网络来到奥地利,再大量连锁式地协助亲戚朋友迁移。这些都能够在上述官方统计数字中获得佐证。20世纪80年代来到奥地利的青田人和温州人先给台湾餐馆老板打工,然后他们逐渐取而代之,并采用自己的方式发展业务。今天,大部分的浙江人都在餐饮业打拼,有些打工,有些当老板。在奥地利,华人经营的餐馆大约有1000多家。另一个浙江人集中的行业就是经营杂货、成衣、玩具和装饰品的批发和零售。浙江人的网络散布欧洲各地,这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例如,经营小商品店的青田商人会从意大利或是匈牙利进货,因为他们的同乡在那里做中国商品批发。近年来,浙江人的连锁移民一直持续不断,拥有百人以上且近亲成员散布奥地利各地的青田人家庭,在奥地利并不稀奇。

不过,除了来自传统侨乡地区的浙江人之外,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其他的华人移民群体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笔者将讨论一些根据原居地或职业背景归纳出来的华人次群体。来自台湾的华人是最早在奥地利奠定餐饮业基础的群体。他们的数目即使不递减,也停滞不变。台湾人餐饮业的衰落除了因为浙江人的出现之外,还归因于台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因为移民到欧洲去工作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结果,许多台湾人离开奥地利,或者回台湾,或者追赶“中国热”到大陆寻找机会。虽然如此,他们却没有完全割断和奥地利的关系,其中许多人仍然保留着奥地利的住所、公民权和网络,经常为工作和商业机会而往返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展现出一种跨国的移民生活方式。他们的第二代一般都接受了良好教育,具有多元化的专业背景,但是他们不像父母辈,对于靠餐饮业谋生并不太感兴趣。台湾人有个突出的行业,那就是高端资讯科技工业,曾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黄金岁月,但在2000年以后开始衰落。千禧年前后发展起来的华人旅游业也吸引了台湾人去经营。据估计,目前居住在奥地利而拥有台湾背景的华人约有2000人。<sup>[24]</sup>

如前所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政治动乱时期,奥地利没有遇上直接涌入的亚洲难民潮。虽然如此,奥地利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大约2000名越南和柬埔寨难民提供政治庇护,<sup>[25]</sup>其中大部分就是祖籍广东的华人。他们在最初抵达奥地利的时候,大部分被分配到林茨(Linz)周边的工业城市,因为这些地方能够提供低技术工作。这些越南和柬埔寨的华人在来奥地利之前和它没有任何关系,有些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由于拥有联合国难民身份,他们从一开始就获得各种各样的资助和照顾。<sup>[26]</sup>奥地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结构性产业变化,不少企业倒闭、工厂关门,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迁移到其他城市如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去寻找工作。这些华人不像浙江人或台湾人,他们中具有企业家潜质的极少。因此,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是支薪的雇员。据旅奥中南半岛华裔难友互助会的创始人郑先生估计,奥地利福利制度提供的良好保护或许是他们缺乏创业动力的缘故。奥地利当局提供的援助和照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能够享受大部分福利,进入奥地利福利制度“自己人”的圈子。

面对医疗劳动市场人手短缺的问题,奥地利首先由菲律宾和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引进医护人员。然后在1991和1996年期间,先后从北京、上海和青岛输入大约共400名的中国护士,以两年合同雇员形式让她们在维也纳的医院和卫生部门工作。招聘计划由维也纳市政府牵头,在与北京、上海和青岛市政府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在这些中国护士当中,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大多在两年合同结束后返回中国,而来自青岛的就留居奥地利。即使有一些青岛护士回到中国,但是意识到两地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于是她们又尝试回到维也纳找工作。目前,这批青岛护士几乎都在医疗和卫生机构就业,形成了华人社群中融入奥地利主流就业市场

的一个小群体。后来她们通过家庭团聚申请丈夫和子女来奥地利定居，有限度地扩大了青岛人的次群体。虽然中国护士人数不多，只属于华人社群中一个微小的次群体，但是她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女性移民轨迹——女性并非作为家属，而是独立的技术移民和经济主体，为一家人牵头开创新生活。

在华人社会最底层的是一些没有合法身份的新移民。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非正规群体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福建和东北三省的中国人。东北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基地，后来在改革初期却最先被其他迈向市场经济的地区所抛离。它被形容为中国的“生锈带”，工厂和矿场关闭，下岗职工人数上升，其中以来自国营企业的居多。尽管这十多年来东北人一直积极往外移民，但这个群体在欧洲的人数却难以估计。有研究显示，东北人往外迁移多由一些移民公司所带动，而这些公司都与官方和国有企业有关联。<sup>[27]</sup>奥地利从千禧年开始见证东北人的到来，其中有不同年龄层和社会背景的，包括学生和五十来岁的下岗工人。一般来说，许多东北人是通过中介公司代办的短期旅游或是商务签证直接来到奥地利，然后逾期居留。

至于来自福建的移民，则通过“蛇头”几经波折偷渡抵达欧洲。在奥地利，比较显著的福建新移民来自三明地区，他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抵达欧洲。作为福建省的内陆山区，三明明溪县是改革开放时期发展起来的旅欧新侨乡。<sup>[28]</sup>而福州地区侨乡的中国人，大部分聚居于英国，来奥地利的不多。与浙江传统侨乡的移民不同，东北人和福建三明人在奥地利没有任何前人建立好的联系网络，他们到达奥地利后一般要更加刻苦地白手起家。有许多人来到奥地利后申请政治难民庇护。难民申请者拥有临时居留证，但是不允许自由进出奥地利。过去十多年中，他们当中有些人最终争取到合法居留以及进入劳动市场的资格，但更多人却处于社会边缘，无论是居留身份或是经济条件都很脆弱。在缺乏合法身份与亲属支援的情况下，这批非正规的中国移民很自然地纳入华人经济活动中的最底层，比如当华人杂货店的低薪装修工人、中餐馆厨房里没有正式登记的厨师或洗碗工、华人家庭里的保姆甚至成为招待中国游客的性服务者。整体来说，这群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新移民，在奥地利华人经济的最底层为自己找到了庇护所，同时也为华人经济提供了既方便又廉价的劳动力，使它能有活力地运作。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可以说部分华人经济是以剥削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增长的。笔者一位来自福建三明的朋友，就是多年来在没有居留和工作许可的情况下为一家华人餐馆当厨师，他的工资总是比其他正规的华人同事少了三分之一。

自2000年以来，奥地利出现了一群引人注目的中国新移民群体，他们是来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留学生。目前，欧洲高等学府有超过12万的注册中国学生，其中以留学英国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德国和法国。<sup>[29]</sup>20世纪90年代向往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一般以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热门国家为目标。然而，在这些国家容纳不下的情况下，留学生退而求次之，选择了奥地利。奥地利在2000年前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数目有限。根据奥地利政府的统计，在国立大学登记的中国留学生数目从2000年的不到400人攀升至2006年的1200人，之后却有下降的趋势，2010年减至1000人左右。<sup>[30]</sup>但是这一数字并不包括私立大学和音乐学院的学生。而供留学生学习的科目除了音乐之外，还包含各种理工科和社会科学。千禧年后几年里蜂涌而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大部分是通过中介公司成行，且视奥地利为求学目的地。当时奥地利的传媒甚至怀疑有在奥的华人中介机构在2002—2004年间违规，非法引进了1800名中国大陆学生。<sup>[31]</sup>作为受过高等教育、能说标准普通话的次群体，年轻的留学生对于奥地利的华人社群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跟非正规的福建人和东北人一样，为华人经济提供最廉价的低技术劳动力，如在中国餐馆里打工或是当家庭保姆；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提供高技术服务，如设计计算机程式、提供音乐培训或是从事中文报纸的文字工作，这些专业能力是其他华人次群体所缺乏的。此外，年轻的留学生中有许多来自国内富有或中产家庭，他们展示出有别于大部分浙江人的生活和消费模式，例如习惯在外

用餐，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奥地利的华人中餐业。

一直以来，奥地利对于外国留学生在学打工和毕业后留奥定居有比较苛刻的管制，而一般技术移民的政策也控制得很严格，不只是门槛高，行政程序也繁琐。<sup>[32]</sup>这也许是造成来到奥地利的高技术华人移民有限的部分原因。2011年通过的《外国人法改革》（Änderung des Niederlassungs- und Aufenthaltsgesetzes 2011）采用了比较宽松的技术移民条款。这是否能够使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留在奥地利就业，以及有力地输入华人专业人士，从而使更多的华人进入奥地利的主流劳动市场，尚不得而知。

年轻留学生的前辈们是一群于20世纪80或90年代从国内大城市来到奥地利的中国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背景相当多样化，难以概说。其中有些当初也是以自费学生身份进入奥地利的，但是由于经济压力和语言障碍等因素，有机会认真地在奥地利高等学府里进修专业的不多。这群同样来自国内大城市的非侨乡移民经过多年的打拼，大部分业已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事业和生活。一部分人凭着专业知识受雇于主流就业市场，比如西门子公司等；另一小部分则坚持以自雇的形式来实践自己的专业和维生，例如一些华人画家和中医师；更多一部分成为华人经济不同领域的开拓者，比如说餐饮业和华人旅游业。在最后一项值得一提的是，兴旺了大概十年的奥地利华人旅游业，其开拓者恰恰是几个来自北京和上海、在国内拥有深厚关系网络的华人移民。

总之，奥地利这个被称为“半周边”的国家不是改革开放早期非侨乡中国新移民的热门选择。不过，战略位置却使它成为几个“移民流向”的共同过境地。在1993年奥地利推出移民法（Aufenthaltsgesetz 1992）之前，申请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的门槛相当低，因此想要到英国、法国等核心移居地的中国人就把奥地利视为进入西欧的垫脚石。有些小企业家趁着“匈牙利热”去匈牙利碰运气，<sup>[33]</sup>后来生意失败了，便尝试越过边界到奥地利寻找一个管理比较规范的商业环境。20世纪90年代在计算机领域打拼的台湾商人，如果想要开拓东欧或西欧市场，在进一步发展业务之前都必须先在奥地利建立基地。偷渡来到欧洲的浙江人原本计划投靠他们在西班牙或法国的亲戚，结果因为旅费不足，只好滞留在奥地利打工。受惠于意大利的特赦政策而取得意大利居留证的福建三明人，因为奥地利的社会福利比较完整以及中餐馆的工资比较高而留在奥地利生活。就这样，本来只想在奥地利短住，然后再上路的中国移民，慢慢地在暂居地建立了工作和社交网络，甚至家庭。如果说这些中国新移民最初暂居奥地利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后来的定居可以归因于奥地利的移民政策、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华人经济所提供的机会。<sup>①</sup>此外，在“中国移民新秩序”的语境中，许多新移民直接来到奥地利寻找机会，尤其是千禧年后的留学生潮和来自东北和福建的非正规移民潮。随着时间的流逝，奥地利从一个落脚处逐渐成为今天中国新移民落户的国家，但它充当过境暂居地的角色并没有完全消失。

## 五、结语

以上的讨论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非单一化的移民轨迹和情况。在多种华人移民潮和流向相互交错之下，奥地利的华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社群，无论在移民来源地或是社会经济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源于这种多元性，华人社会内部出现了阶层划分。来自传统侨乡的浙江人是1980年后最早形成且数量最多的一个华人次群体。他们拥有丰富的支援网络，一般经济稳定，如果不是固定受薪的，就是华人中小企业的老板。可以说，浙江人是奥地利华人社会的主体。而台湾人和早期来自国内大城市、有相当教育程度的新移民亦能够在各自的行业里有所发挥，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部分更在新兴的华人旅游和文化产业中积累了财富和建立了社会地位。相对

---

<sup>①</sup> 这里所指的政策和华人经济等因素，对华人社群各有其正面与负面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详细讨论。



于这几个次群体，后来者如东北人和福建人则多未获得正式的居留，经济条件脆弱。他们虽然被视为华人经济中的新鲜血液，提供了方便廉价的劳动力，但却处于地位低微和被剥削的困境。年轻的留学生是最有可塑性的一个次群体，他们也在华人的灰色经济中打拼，不过学生身份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机会向上流动的优势。

此外，我们也在整体欧洲华人移民格局中看到了奥地利在不同时期的角色消长和华人移民痕迹。在 20 世纪初期青田人迁移欧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奥地利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二战后，在沸沸扬扬的华人移民潮中，奥地利却只静悄悄地接收了少量的台湾人。改革开放初期，奥地利并不是大部分华人的首选移居地，除了侨乡移民，它接收的是其他热门国家过剩的华人移民，数目相对小。到了 20 世纪末，奥地利的华人移民景观因为两种历史因素的遇合而慢慢地产生变化。第一个历史因素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是东西方冷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结束。前者在与全球化等其他因素互相激荡下形成了“中国移民新秩序”的格局，对中国人的全球性移民造成深远的影响，延及奥地利。后者则为奥地利及其周边国家带来重大的改变：对于中国移民而言，冷战后东西方集团取消政治边界，使奥地利成为他们在流向西欧、东欧或是南欧的旅途中最受欢迎的通道。正因如此，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许多当初前来落脚暂居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在奥地利落户，建立起他们的家园。

[注释]

- [ 1 ] Eurostat, “Population by sex, age group and citizenship”,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
- [ 2 ] 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 年第 5 期；李明欢 《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 [ 3 ] 李明欢 《欧洲华人社会巨变是欧洲华人研究的强大动力》，《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 [ 4 ] Frank Pieke, “Editorial Introduction: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Chinese Migration Order”,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 2007, pp. 81 – 94; 李明欢 《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宋全成 《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分析》，《山东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第 146 – 150 页。
- [ 5 ] Frank Pieke,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2002. 根据 Frank Pieke 的分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作为华人移民的移居地，大致可以分成三大区块：西欧、南欧和东欧。西欧包括华人移民的旧核心国如荷兰、英国和法国，南欧指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东欧包括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和南欧是 1980 年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华人移居地。
- [ 6 ] 有关奥地利华人的零星文章，见注 11 – 14、18、22。近年出现而未发表的硕士论文有：Lena Springer, *Professionelle und kulturelle Positionierungen von Aerzten für chinesische Medizin aus der VR China in Wien*,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Vienna, 2004; Wang Kuo-Chiang,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Vienna: Identitie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Vienna, 2008; SchäCarsten, *Auslandschinesen in Oesterreich – Identität und Identitätskonstruktion zwischen Heimat und Fremd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Ouzhou Lianhezhoubao Aodili*,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Vienna, 2009; Katharina Elisabeth, Hausner, *Integration durch Selbstständigkeit. ChinesInnen und TaiwanInnen im Ethnic Business*,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Vienna, 2009.
- [ 7 ] Michael Summerskil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s Chinese Work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ichael Summerskill, 1982; 李明欢 《战前中国人移民西欧历史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 [ 8 ] [15] Mette Thunø “Moving Stones from China to Europe: the dynamics of emigration from Zhejiang to Europe”, in Frank Pieke and Hein Mallee ( eds. )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 Richmond: Curzon, 1999, pp. 164 – 167.

- [ 9 ] 李明欢 《战前中国人移民西欧历史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 [10] Daniele Cologna,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Ital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n Ethnic Enclave Economy”, in Ernst Spaan, Felicitas Hillmann and Ton van Naerssen ( eds. ) *Asian Migrants and European Labour Markets: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mmigrant Labour Market Insertion in Europ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268.
- [11] Barbara Kreissl, “Merkmale der chinesischen Migration nach Österreich”, *China Report* 131 – 132, 1999, pp. 60 – 61.
- [12] Reichspost, 19 – 02 – 1913; 引自 Michael John and Lichtblau Albert, “Die Chinesen”, in *Schmelztiegel Wien, einst und jetzt, zur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von Zuwanderung und Minderheiten*, Wien: Böau, 1990, pp. 61 – 62.
- [13] 李阳 《旅奥华人史漫谈 1》，《奥华》1991 年第 1 期。
- [14] 李阳 《旅奥华人史漫谈 2》，《奥华》1991 年第 2 期；亦参见 Michael John and Lichtblau Albert, *Schmelztiegel Wien, einst und jetzt, zur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von Zuwanderung und Minderheiten*, 1990, pp. 61 – 62.
- [16] [17] 俞叔平 《留学时代的回忆》，载《欧华》1993 年第 10 期。本文原发表于 1977 年 6 月台北《创新》周刊，奥地利《欧华》报于 1993 转登。俞叔平又名俞运佳，长期供职于外交界，1979 年故世于台北。
- [18] 李阳 《旅奥华人史漫谈 4》，《奥华》1992 年第 4 期。
- [19] [20] Wiener Tageszeitung, 29 – 07 – 1948; 引自 *Schmelztiegel Wien, einst und jetzt, zur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von Zuwanderung und Minderheiten* Wien: Böau, 1990, pp. 61 – 62.
- [21] 晓地 《异乡四十年——记徐芝秀教授》，《欧华》1995 年第 5 期。
- [22] Kaminski Gerd and Else Unterrieder, *Von Österreichern und Chinesen*, Wien: Europa Verlag, 1980, p. 991.
- [23] 参见 2002、2005、2011 奥地利统计年报。
- [24] 这是笔者 2005 年访问旅奥中国人协会前会长王玉麒先生所获得的资料。
- [25] Eduard Stanek, *Verfolgt, Verjagt, Vertrieben: Flüchtlinge in Österreich, von 1945 – 1984*, Wien: Europa Verlag, 1985, pp. 155 – 167.
- [26] 奥地利政府设立了一个赞助计划 ( Patenschafts program )，为每一个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家庭安排一个当地的 家庭，满足他们在移民初期在住房、就业、医疗以及子女学习等方面的需要。详情参见注 25。
- [27] Marc Paul, “The Dongbei: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 in Paris”, in Pal Nyiri and Igor Saveliev ( eds. ) *Globalising Chinese Migration*, Ashgate: Aldershot, 2002, pp. 120 – 128; Xiang Biao, “The Making of Mobile Subjects: How Institution Reform and Outmigration Intersect in Northeast China”, *Development* 50 ( 4 ), 2007, pp. 69 – 74.
- [28] 李明欢、江宏真、俞云平 《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 调研报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亦参见注 5。
- [29] Eurostat, “Foreign students by level of education and country of origin”,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ducation/data/database>.
- [30] 数据参见 Austrian Federal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Datenwarehouse Hochschulbereich*, <http://www.bmwf.gv.at/unidata>.
- [31] Die Presse, “1800 Chinesen als Studenten nach Österreich geschleppt”, 09 – 06 – 2004.
- [32] Kwok Kim, “Rechtliche Rahmenbedingungen Migrantischer Kulturarbeit in Österreich”, in Andreas Gebemair et al ( eds. ) *Randzonen der Kreativwirtschaft. Türkische, chinesische und suedasiatische Kulturunternehmungen in Wien*, Wien: Lit Verlag, 2009, pp. 123 – 132.
- [33] 中国公民于 1988 年 10 月至 1992 年 4 月期间可以免签证进入匈牙利。估计大概有 4 万多人通过匈牙利而到 达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北美国家。这期间，匈牙利的华人数目剧升，市场上堆满了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这 段热潮被称为匈牙利热。参见茂春 《中国人在东欧》，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 年；Nyiri, Pál, *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